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鸦片战争150周年学术座谈会

周源　华立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资料室

1840年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今年适逢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3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在本校举办了"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学术座谈会"，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历史系共同筹办，来自首都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及新闻出版部门的六十余名中国近代史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进行座谈。座谈会的主题是："鸦片战争以来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和"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到会专家学者围绕这两个主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会议开得十分热烈而紧凑。先后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宝华，《求是》杂志副总编苏双碧，中国史学会会长、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郭毅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牟安世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书局总编李侃，国家教委政治教育司副司长杨瑞森，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与艺术教育司原司长夏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李文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丁守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总编徐宗勉，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桂生副教授，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张一文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副教授，《近代史研究》副主编夏良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张振鹍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王汝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叶凤美副教授。

一、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高度发扬及其意义

与会学者指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150年前，英国资产阶级为保护他们肮脏的鸦片贸易，蓄意制造发动了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1840年2月英国就决定派遣侵华远征军，6月到达中国海面，开始进犯广东、福建、浙江及天津沿海。大约在十一、二月，英国与琦善谈判，在"川鼻草约"中就向中国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于次年1月26日武装侵占了香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1840年是丧失主权，蒙受列强侵略和凌辱的开始。从此，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的代表还指出，今年不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130周年，以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90周年，甚至英国方面第一次提出割占香港的要求也是在1840年，距今也是150周年，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任人宰割，苦难重重，走过了异常艰辛的道路。联想到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这一系列国难国耻，抚今追昔，不能不让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但是，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鸦片战争中，地主阶级抵抗派

和广大人民群众英勇地抗击英国侵略军，奏响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乐章。此后，许许多多优秀的爱国人物，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富强，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其事迹可歌可泣。因此那种认为中国近代的历史仅仅只是一部屈辱史的看法是片面的，它同时又是一部人民群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历史。今天我们纪念鸦片战争这一事件，归根结底是要纪念150年来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反抗斗争，继承 和发扬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不少学者在发言中谈到，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地丰富发展。有人着重指出，屈原、岳飞、文天祥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人物、爱国英雄，他们的爱国主义 或 表 现为抗击异民族，异政权的压迫和侵略，或表现为反抗黑暗统治、反对反动暴政，减轻或解除本国、本民族人民的苦难。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近代史上最突出最根本的矛盾。社会矛盾的这一变化，使得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扬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古代的爱国主义相比，近代的爱国主义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百余年来，这种爱国主义思潮不断高涨，一浪高过一浪，它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历史，直 至今天。中国在遭受了如此之多的帝国主义侵略，经历了如此众多的惨重残酷的战争之后，之所以仍然能够生存，最终没有被帝国主义瓜分灭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下人民群众的反抗，使帝国主义不能够也不可能灭亡中国。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民族赖以生存、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

到会学者强调，继承发扬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在今天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爱国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和可贵的品质，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乡土、亲人、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育、生长、成熟。人们无论何种宗教信仰，何种职业或民族成份，心底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蕴藏着深厚的爱国主义。这种崇高精神的发扬，就能够变成切切实实的物质力量。过去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我们渡过了多次民族危机，今天要实现社会稳定，从事四化建设，也必须有这样一种凝聚全体人民，凝聚全国各民族的精神力量。十多年来我们改革开放成绩很大，世界瞩目，但也遇到不少困难：政治、经济、国内、国外，风风雨雨，很不平静。困难虽多，并不可怕，中国有句古话，叫“多难兴邦”，关键要有解决困难的条件和对策。我们应有艰苦努力、自尊自信的观念，要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树立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精神。

有的学者还指出，前几年在如何看待爱国主义，应否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提倡等问题上曾经出现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一些人公开表示“不赞成爱国主义这个口号”，甚 至 斥之为“反动的”，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认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凡是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积极要求社会变革，争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志士仁人，没有一个不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那种将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骄心理相提并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摒弃爱国主义，听任上述有害论点的传播，很容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导致全面否定 我 们 的历史和现实，其后果将是严重的。

二、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们今天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除了要继承、发扬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还要科学地总结这150年来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有的学者指出，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与世界隔绝，因此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却妄自尊大，把自己视为"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而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是应向中国朝贡的"夷狄"，以至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还在追问英国在什么地方？周围几许？和中国"回疆（即新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那些封疆大吏、统兵大员对这些普通的世界地理常识也一无所知，他们向道光皇帝提供的情报和建议谬误百出。正如后来姚莹所指出的，英、法、美等国虽距中国万里之遥，但为殖民扩张的需要，长期一直刺探有关中国的情报，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详，而中国方面一直没有也不屑于主动了解国外形势，这样一来，仗还没打，"胜负已昭然也"。对世界形势的无知和错误估计，是导致在鸦片战争以至后来几次对外战争中，中国方面失败的重要原因。可悲的是，在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封建顽固势力不仅未能认真总结、汲取这个教训，亡羊补牢，改弦更张，仍然拘泥古法，"恪守祖训"，浑浑噩噩，苟且偷安，并对主动去了解世界形势并进行改革的人进行阻挠、打击、迫害，谁要购买西洋船炮抵御外敌，被指责为"糜费"，谁要刺探了解外情，则被斥为"多事"，以至在以后的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这里面教训十分深刻。

有些学者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苦难深重，尽管中国人民从未停息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斗争，但这种斗争总是失败，未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个问题十分值得深思。马克思主义认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外因，而内因则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所以欲救国救民，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状态，全面走向近代化，迎头赶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需要寻找一条改变落后状态，实现近代化的有效途径。就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而言，这条途径就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顽强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大胆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早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就开始"睁眼看世界"，组织人翻译《四洲志》，以了解外情。魏源则更进一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赶写出了《海国图志》，并一再增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林、魏进步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他们最早意识到中国确有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处，开始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事物，奋起直追，谋求祖国的富强。

有的学者指出，近代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先进分子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承认落后，又不甘于落后，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设计了一套又一套救国救民的方案，走过了一条循序渐进，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中国要实现近代化，任务复杂而艰巨，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而不能是枝枝节节的修修补补，用今天的话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在当时，人们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中的"长技"还主要是从科学技术方面着眼，既使如此，也未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甚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未产生多大反响，《海国图志》在国

内遭到冷遇，而在日本却受到欢迎，广为印刷，日本人如获至宝，称之为“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对于日本的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继承了“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付之实践。在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期间，政治上虽也有所变化，但变化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方面，兴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仗，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要救国救民，非改变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可，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结果，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封建顽固势力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不堪一击，“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光绪皇帝被囚居，六君子伏尸都门，康、梁流亡海外。随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制，建立了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无数志士仁人抛头胪，洒热血，奋斗的结果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等军阀武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把“中华民国”当成一个空招牌，将其玩于股掌之中。痛定思痛，又一代新人崛起，他们意识到，光变革政治制度还不行，还要用新思想启迪、教育人民，于是出现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流派形形色色繁多庞杂，其最大的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从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无论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民主派，都未能使中国摆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真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事实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三、关于爱国主义与向西方学习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109年的历史发展中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条是向西方学习真理，后者也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这里涉及到近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关系问题，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严肃的救国方案，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有其他方案，如顽固派拒绝一切外国的东西，把中国封闭起来，这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因此，在近代的中国，爱国主义必须落实到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上，就当时的国内情况、国际环境而言，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反之，救国救民的探索，也离不开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否则，这种探索就会走入歧途，甚至带来恶果。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也有过拒绝一切西方事物的“爱国主义”，如义和团运动。但从主导方面看，爱国主义与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是相统一的。如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头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他身上具体体现二者的统一。魏源在鸦片战争中是抵抗派，并写出了《海国图志》，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本身就包括学习西方（“师夷长技”）和抵御外侮（“制夷”）两个方面的内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政治方案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样表明了两者的统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既十分鲜明，他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事物的广度与深度也发展到一个

新的、更高的阶段，足以证明，反帝爱国与向西方学习并不相互排斥。

有的学者强调，我们赞扬和肯定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全盘西化”的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但既使在那时，就有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反对盲目迷信、崇拜西方的思想文化，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他们当时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有科学、透辟的认识，但他们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完美，存在许多弊病，如贫富悬殊、失业、罢工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和压迫中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对待中国和其他弱小国家一点也不文明，甚至野蛮。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去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不加分析批判地引进西方文化，把“全盘西化”当成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四、关于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

一些学者在回顾鸦片战争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时表示，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仍有重申和明辨的必要。

他们指出，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发动的侵略战争，它的直接起因是英国企图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毒品，在遭到中国方面的抵制后，便不惜利用战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卑劣目的，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在中国获取更多的权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称第一次中英战争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恶果，在战争爆发前就已显露出来。以财政为例，由于鸦片输入而白银外流，致使国家财政穷竭，官民两困。据粗略估算，仅道光十八至二十年间白银外流就达1亿2千多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银两收入的三倍；至于鸦片泛滥给人民身心造成的极大毒害，更是触目惊心，其事例不胜枚举。正是鉴于这种情形，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抵抗派中的有识之士起而抵制，大力禁烟，由此揭开近代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序幕。不言而喻，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侵略行径，而林则徐等人抵御外侮的爱国举动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称颂。

然而对于这样一些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基本问题，近几年来出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大家列举了其中几种有代表性的议论，如（1）是鸦片战争使西方文明和近代先进生产方式得以进入中国，因此鸦片战争不是打早了而是打晚了；（2）鸦片战争无非是“通商”的战争，英国要通商，中国不愿意，所以发生冲突；（3）战争因邦交制度不同引起，中国是封建朝贡制度，外国是近代外交，中国不愿与对方平等交往，于是发生战争；（4）鸦片战争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海洋文化进入中国自鸦片战争始等等。总而言之，对鸦片战争不应唱挽歌而应唱赞歌。与会学者指出，这些言论虽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即没有把握住这次战争的性质。诚然，中西制度不同，文化有差异，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的同时带来某些新的生产方式，但不能用此代替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正如毛主席在批判“白皮书”时所说，是“友谊”还是“侵略”，这一点必须分明。况且帝国主义在中国建铁路、开工厂、办学校，着眼点与在其本国国内完全不同，意在加紧掠夺，变中国为其附庸，而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如果不从总体上考察问题，不看在什么社会环境下引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又掌握在谁手里，就会对很多问题辨别不清。近代化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

进行，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中进行，社会条件不同，进程、效果也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政腐败统治的条件下，决不可能有真正的近代化，在今天弄清这一点十分必要，可以使我们正确地认识近代历史，更好地发扬百余年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史学工作者，深感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我们应把这150年来的历史当作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材，大力宣传这150年间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抗击外来侵略压迫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热情讴歌那些为民族独立而献身的杰出人物；同时，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使爱国主义观念、民族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凝聚力；我们要认真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以唤起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我们还要学习和继承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些为救国救民而不断探索的先进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积极开拓，大胆创新的精神，有勇气有魄力对外来文化进行鉴别、吸收，并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融汇贯通，以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还要对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国情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赶超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能幻想一夜之间中国就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逐步达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对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